

文学评论中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理论误区

何 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武汉

邮箱: 12433412@qq.com

摘 要: 后现代主义文论最大的理论误区在于颠倒了现象同本质的关系, 从而抽空和置换了文学最本质的东西, 即人性和审美。传统的文学基本命题是“文学即人学”、“艺术即人性”, “艺术即形象思维”。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命题是: “语言即形象”, “艺术即手法”。形象成为了“各种不同主语的固定谓语的能力”, 这样就颠覆了文学的本质。他们从根本上无视文学审美与文学人性等本质性的东西, 而专门在现象上大做文章, 偷天换日地将文学转换成了冷冰冰的语言学, 沉迷于文学语言学的学究式考据, 停留于语言学分析的技术操作层, 使得文论丧失了对文学指导的前瞻性与批判性。这种“玩文学”的做法竟然把文学理论变成了一场纯粹的语言学游戏, 因而值得人们反思。

关键词: 后现代文论; 语言学; 人性; 形象性

收稿日期: 2019-08-12; 录用日期: 2019-09-07; 发表日期: 2019-09-22

The Theoretical Errors of Postmodernism in Literary Criticism

He Hong

Abstract: The most thing of theory mistake to post-modernism is to reverse the connection of phenomenon and essence, so it makes time and permutes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This essence is human nature and aesthetics.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ccents that literature is human knowledge, art is human nature, art uses image thought. But post-modernism says that tongue is image, art is technology, and image turns into the ability to roots predicate. So, they overthrow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They disdain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for human nature or literature aesthetics, and they wallow philological phenomenon and philological textual research. So, these theories lose literature auspice and instruction. They make literature theory to be a philological game. This is good for us to rhetorical ques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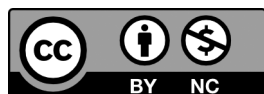
Key words: The literary theory of post-modernism; Philology; Human nature; Graphic art

Received: 2019-08-12; Accepted: 2019-09-07; Published: 2019-09-22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后现代文论最大的思维误区在于颠倒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把文学评论变

成了专一分析作品语言结构的语言逻辑主义或者词语中心主义，从而抽空和置换了文学最本质的东西，即人性和审美。

上述物极必反的悖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与文学本身的脱节，陷入了为理论而理论的误区。众所周知，德国康德哲学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现象命题，从而建构了古典文论的基石。康德强调，现象是“自在之物”，或称“物自身”刺激人类感官而形成的一种主观感觉表象[1]。因为这类主观感觉表象本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现象根本就无法真实地反映“自在之物”的基本性质，于是它仅仅作人的主观心理表象而存在罢了。感觉也不可能是沟通主体与客体的管道，反而可能造成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断裂。因而“跟着感觉走”一类陈词滥调是极其危险的，时时把人们引入误区而陷入无可挽回的歧途。因为它不可能把思维的导向引向本质，这就是感觉的最大谬误。本质是什么东西？本质永远滞留于现象之外，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彼岸世界”，可见“彼岸世界”才是一切文论应该追求的首要目标，任何一种文论体系的价值存在都必须以其同“彼岸世界”的距离和揭示“彼岸世界”的程度而确定[2]。20世纪文论的重要开拓者卢卡契在《现实主义辩》和《审美特性》[3]等文章中，极其深刻地探讨了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现象与本质问题。卢卡契认为文学艺术领域中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挖掘出隐含在现象底下的本质，这是衡量文学深度标准。二是不同的现象显然反映出不同的本质，因而对不同现象进行研究也就会创造出不同文论的风格特色；例如现实主义追求的本质是客观的，表现主义追求的本质是主观的，这就显现出惊心动魄的价值分野。三是本质体现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显现出一个僵死的终点，因而文学对本质的体验和挖掘也必然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四是现象与本质在艺术上的统一形态就是典型，例如卡夫卡笔下的典型格里高尔就是现代人性被异化的典型。五是意识形态对于艺术家探询本质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指导，因而对艺术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依据康德老人和改革先锋卢卡契关于现象与本质的理论来观照当前汹涌泛滥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就十分容易地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裂痕。流行的并不见得伟大，正像大街上喊得最响的二道贩子多数是在贩卖假冒伪劣一样，看一看当前在文艺界发红发紫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人们

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在那五颜六色的迷人外表下所散发的一大堆臭哄哄的霉菌。这些五光十色泛滥流传的文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割裂现象与本质的联系,甚至以现象来偷天换日地取代本质,从而造成一大堆脏兮兮的理论误区,一大块理论大厦的崩塌。当然也不能将后现代主义文论全盘否定,在这个纷呈繁复变幻万千的理论大卖场中,的确有一些极富有创新意识和真知灼见的文论流派,例如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作为基础的后精神分析学派,以弗莱为代表的神话原型理论、以及德国姚斯的接受美学流派,等等。而上述文论派别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理论成就和理论建树,恰恰在于他们通过否定之否定的理论思维而摒弃了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荒谬主张,重新回归到现象与本质趋于整合与联结的思维模式上来,从而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理论误区进行了再反思、再批判和再突破,因而能够取得引人瞩目的巨大成功。例如当代最伟大的文学探索者之一博尔赫斯就断言说:“文学最伟大的建树就是发现了人[4]。”

后现代主义触目惊心的理论溃瘍和最大的思维误区在于他们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的联系,思维与存在的联系,他们一方面叛逆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传统美学,另一方面又无法建构自己坚实深邃的理论基础,从而像盲人瞎马一样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理论歧途。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这类后现代文论家将形而上的理论视野一古脑儿统统抛弃,而转向了形而下的技术操作层。什么能指所指,什么历时性共时性,什么诗的符号同散文符号的二项对立,他们简直像磨刀霍霍的屠夫一样把作品分割成各式各样的语言结构或者修辞结构,这种理论视野的狭小与局促必然导致他们见识的浅薄与轻浮。后现代主义文论最核心的命题是还原,无论是现象学还原还是符号学还原,也无论是结构性还原或者解构性还原,都把文学还原成了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语言文字组合。众所周知,后现代文论的主体建构来自于其先师索绪尔的语言学,无论是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或者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无论是美国沃伦或者维姆萨特的后期英美新批评派,都是无一例外地专钻语言学的牛角尖,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重新建构文学理论,而且都无一例外地把新鲜活泼的文学关进语言学的牢笼,进而把文学变成语言学的附庸。依据后现代文论的著名领军人物布鲁克斯的话说,“逻辑跟别人吵架,诗跟自己吵架,要解决诗人自身的这种矛盾,诗人必

须彻悟到诗的本质是矛盾的调和 [5]。”很明显,注意语言学意义的“矛盾的调和”,抽空与置换了文学反映人表现人和升华人这个至关重要的本质,从而把“文学是人学”这个充满真理意味的命题生成转换成了文学是语言学的荒谬误区。请看看后现代文论所热心追捧的东西:后现代文论名家、德国学者卡西尔最得意的论题是《语言和神话在人类文化模式中的地位》,并且以柏拉图《斐德若》中的苏格拉底对话为例,声称“古典研究都是以语言学和词源学来充当工具”,“名与实具有内在联系,名实的潜在同一性被确立为一条方法论原则。”因而“所有真理的内容只是人们用概念编织出来的虚幻图式,不能作为标准来衡量,并只有从心智诸形式的自身内部才能找到衡量的尺度和标准”。这类文论的最大特色就在于采用语言学的工具论来取代文学的人性论,这样文学也就无一例外地从属于语言学,变成了语言学的事例或者引证。如果文学转换成了语言学的事例,那么文学本身还能留下什么?恐怕只能仅仅留下一大堆谁也看不懂谁也不需要的符号。因而把文学变成纯粹的符号,这就成为后现代文论的价值平台和基本价值尺度,而研究文学语言表意层的对等转换或者是不对等转换,这便成为后现代文论肢解或者解构文学的基本思路。以致于一位语言学者一语道破天机:“语言应该成为文学属性本身的设定”更荒唐的是,结构主义“前四子”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富柯、阿尔杜塞,以及“后四子”罗兰·巴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热奈特,最感兴趣的是文学的语言结构,什么表层结构、深层结构,什么二项对立,复合结构,什么共时与历时、横组合关系与纵组合关系、语言与言语,代码与信息,什么能指、所指与意指、秩序与序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这类花样翻新的语言学游戏背后,就是一大堆纯粹现象的罗列,至于文学的本质却完完全全被抽空与置换掉了,变成了一大堆毫无生气的词语结构,一个丧失了灵魂的僵尸!所以,后现代主义文论最大的误区,就在于他们形而下的思维结构本身,他们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分析来将文学还原成语言学,完全抛弃了文学最本质的东西,即文学至关重要的审美和人性!

后现代文论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割裂现象与本质的内在联系,只要现象,不要本质,从而彻底异化和解构了文学,并将文学研究变成了一场苍白空洞的游戏,至于这个苍白空洞的理论黑洞究竟有多大,对文学研究的损害究竟有多么幽深?

多么惨烈？人们不得而知，也无从探究。人作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复合体，无论从价值导向或者最终价值界定来说，都应该把人作为文学的主体定位，凡是离开人、离开人的审美或者离开人性讨论文学的东西，最终都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文学的历程本身就充满了艰难曲折，充满了悖谬，后现代主义文论以语言学的自然关系或者逻辑关系来对抗后现代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文明社会对人性的毁灭，这本身就是一次颠覆，一次反叛。而后现代文论的主题尽管定位于“还原”，这却并不是人性的还原，向人自身的本质型还原，而是朝着语言学方向的异化型还原。他们摒弃了诗意化和粗俗化两类命题，把传统诗学至关重要的诗意与粗俗的命题讨论转换成了纯粹的形式问题，同时又不排除某种超越形式而流于非道德状态的东西。如果说突破传统禁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后现代主义行为，那么这类行为也就必然与某一类敏感的客体产生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又千丝万缕地关联着一定的主体。无论禁忌的消解与否，他们企图颠覆全社会的思想的企图都不可能有多少值得一提的建树，更不用说什么有益于人类文化的创新了。而在实际的文化运行机制中，这多半存在于一种善意的很难诉诸于实践的愿望，因而这一主体构成的一系列轨迹也就难免拖上一条长长的可笑的形式主义尾巴，从而陷入一个僵局，一个无法解脱的荒谬悖论。他们既缺乏文学规则执行人的监督和裁决，也缺乏这一理论建构本身的说服力与感性体味，成为一种高悬在半空中的东西。事实上，后现代文论最根本的思维定势就是追求文论与文学创作的剥离，他们不愿意承载过多的文学义务，也拒绝给任何文学创造或者文学欣赏提供理论资源或者理论指导，从而陷入了一个为了理论而创造理论的怪圈。因此，后现代文论同鲜丽活泼的文学实践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拉越远。由于文论对于文学创作缺乏最起码的亲合力，因而二者也就变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并不交涉。文论本身存在的价值就是为指导文学而设定的，由于后现代文论越来越远离新鲜活泼的文学实践，尽管这类文论语言学探索方式使得我们宽容的文学心态无法接受所有的诘难，但是这种形而下层面的语言技术操作本身难道就不值得每一个文论家深思和反省吗？

传统的文学基本命题是“文学即人学”、“艺术即人性”，“艺术即形象

思维”。甚至连形式主义者波捷勃尼亚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特别是在诗歌中。”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命题是：“语言即形象”，“艺术即手法”。形象成为了“各种不同主语的固定谓语的能力”，他们研究诗歌，无非是研究象征的变异、否定性排偶、比较、重叠、对称、夸张的异同，这类研究还多多少少有一点文学的韵味，同一般习惯上称为修辞格的内容基本相同。例如被后现代文论家称为先师的形式主义者维谢洛夫斯基就提出了文学创作力的节约原则，并指出：“风格的优点正在于，用尽可能少的词提出尽可能多的思想。”但这类评论将文学研究锁定于修辞学范畴，这本身就够狭隘的了。虽然这类研究还多少能够认同于审美，但已经在文论研究中排除了人性。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罗兰·巴特与德里达所鼓吹的“创造性毁灭”事实上已经把文学审美价值这类最后残存的一点点文学性也给解构掉了，颠覆掉了，这就是人们惊呼的“现代主义衰竭”或者“后现代主义衰竭”。文学理论成为了一大堆语言学技术操作层面的重新组合，成为了文学理论语言学，或者语言学建构的文学理论。这种对文学理论价值尺度的颠覆一如恐怖的卡桑德拉巫女预言，将文学本身带进了一场时旷日久的灾难和迷狂。这类所谓的文学领域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调整掉的是文学性、审美性和人性，保留的是纯粹的语言学游戏。他们讨论的是狄更斯笔下“娃娃新娘”一类词汇组合生成规律，格林笔下“睡美人”意象的语言学构成，以及现代女性主义小说“被男人唤醒”一类文化母题的组词规律和语法结构，还有英语中的“花瓶”同汉语中的“祸水”、“狐狸精”等等词语的多重对应关系。甚至连70年代充满革命性与挑战性的女性主义文艺理论，诸如肖沃尔特的“激进的女权主义”以及波伏娃的《第二性》所唤起的竞争意识，如今也不约而同地改换了面孔或者改换了门庭，投靠到了老祖宗索绪尔的语言学旗帜之下，一心一意地研究所谓“女性话语”的语言学构成[6]。一旦女性主义堕落成或者蜕变成女性语言学，其充满批判锋芒与青春风采的“女性价值”也完全被“语言学价值”所取代，这类玩艺还能剩下什么，人们不得而知。

总之，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确误区多多，他们从根本上无视文学审美与文学人性等等本质性的东西，而专门在现象上大做文章，偷天换日地将文学转换成

了冷冰冰的语言学，沉迷于文学语言学的学究式考据，停留于语言学分析的技术操作层，使得文论丧失了对文学指导的前瞻性与批判性。这种“玩文学”的做法竟然把文学理论变成了一场纯粹的语言学游戏，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文论另立门户，完全剥离了文学创造与文学欣赏一类最基本的文学价值，它究竟还能剩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 康德. 康德美学论文集 [M]. 香港: 香港三联书店, 1999.
- [2] 卡尔维诺.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3] 卢卡契. 卢卡契论文学 [M]. 香港: 香港三联书店, 1999.
- [4] 博尔赫斯. 作家们的作家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 [5] 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 方法研究 [M]. 香港: 香港三联书店, 1999.
- [6] 布雷德伯里. 现代主义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